

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

黃毅志**

**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能完成本文，必須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委員，與瞿海源、章英華、熊瑞梅、張笠雲、傅仰止、林南、劉奕蘭諸位教授的指正，以及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張怡貞、林玟漣、邱慧玲的協助。文中缺失，作者自負。

中文摘要

近年來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量化社會階層化研究，大多把分析的焦點擺在“影響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因”，就如地位取得研究所作的；而有關“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果”的研究，如探討客觀階層位置對於“生活機會或風格”，與相關連的“心理幸福”的影響之研究，特別是後者，卻還做得不充份。固然地位取得研究者很可能也預設著“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如職業，對其生活機會有很大的影響，進而對於心理幸福也有很大的影響”，不但為社會上多數人所爭取，亦值得階層化研究者詳加研究，然而這項預設是否正確，仍有待探究。

本研究運用已蒐集許多年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全國性大樣本資料，針對上述預設作探究；在概念架構上，除了分析客觀階層位置，如職業、收入、教育，以及階級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之外，並進一步探討最近在社會學理論發展上廣受矚目的“社會網絡”，相對於階層的影響，所具有的影響大小又是如何！

研究發現顯示：就台灣地區民眾而言，一個人的教育、職業、收入，以馬派階級位置所代表的本人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這包括整體的快樂、煩惱程度以及相關的心理健康，可說是沒有多大的關連；低階層的人並不會由於知足而快樂一些，而降低煩惱，並減少心理健康問題；相對而言，高階層者也不會因為工作的條件較佳，資源較多，而增加多少快樂，降低煩惱，以及減少心理健康問題。

就台灣地區民眾而言，與心理幸福的整體關連較強的，主要是個人社會網絡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社會整合越密，關係品質越佳，心理越幸福。固然個人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對於心理幸福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社會階層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往往不大，社會階層透過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進而對於心理幸福的間接影響也就很小。

本研究的發現，與林南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發現顯相當一致；相形之下在西方社會所得到的研究發現，較能凸顯出客觀社會階層變項的影響力。在同樣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與中國大陸所得到的研究發現，有別於西方社會，很可能與兩種不同社會對於“個人主義”的關注程度不一樣有關。很可能在西方社會比較強調個人主義，追求個人成就，因而本人客觀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影響較為明顯；與中國大陸同樣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特別強調“他人取向”，因而

社會網絡的影響也就顯得特別重要，本人社會階層的影響就小多了！

關鍵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心理幸福、個人主義、他人取向

近年來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量化社會階層化研究，大多把分析的焦點擺在“影響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因”，就如地位取得研究所作的；而有關“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果”的研究，如探討客觀階層位置對於“生活機會或風格”，與相關連的“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如生活快樂或心理健康與否之影響的研究（參 Rosenberg, 1995: 146-147），特別是對“心理幸福”之影響的研究，卻還做得不是很充份，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固然地位取得研究者很可能也預設著“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如職業，對其生活機會有很大的影響（Blau and Duncan, 1967: 5-7），進而對於心理幸福也有很大的影響，不但為社會上多數人所爭取，亦值得階層化研究者詳加研究”，然而客觀階層位置對於其生活機會與心理幸福之影響究竟如何，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卻不是作得很多。這種現象在台灣顯得特別明顯，畢竟多數的研究者著力於探討“一個人所取得階層位置之因”研究。

地位取得研究所探討的階層化因果機制，固然也是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並且也已累積了非常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有關“一個人所取得階層位置之果”的系統性研究，卻沒受到應有的重視。若依 Davis（1982: 569）的觀點，地位取得研究之興起，可說是掩蓋了探討“階層位置之果”的階層化研究數十年來之傳統，而這項傳統可溯及 Sorkin（1927），Lipset and Bendix（1959），Kohn（1969）等人之研究，不但意義重大，而且源遠流長，實有加強探究之必要。

本研究和 Davis 所強調的一樣，可說是要回到探討“階層位置之果”的傳統取向。本研究不但用到已經有系統地蒐集許多年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全國性大樣本資料作分析；在概念架構上，除了分析客觀階層位置，如職業、收入、教育，以及階級對於

心理幸福的影響之外，並進一步探討最近在社會學理論發展上廣受矚目的“社會網絡”，相對於階層的影響，所具有的影響大小又是如何！

一、文獻檢討

關於一個人的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性，可能有許多人會覺得高階層的人並不一定比較快樂，低階層的人反而可能會由於知足而快樂一些。然而，有許多西方社會（主要是美國）的研究都一再地顯示：階層越高，越是感到快樂，心理越健康，或心理健康的問題越少（Aneshensel, 1991; 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 Kessler and Cleary, 1980; Link et al., 1993）。

固然這項“階層越高，越快樂，心理越健康”的關連性已得到許多研究的支持，然而這項關連性，究竟是由於“不快樂、心理健康有問題導致低社會階層，而快樂、心理健康導致高社會階層”所造成；還是由於“階層越高，有越多的資源提高快樂，降低不快樂”所致，仍然有些爭議性。不過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貫時性追縱調查研究都傾向於支持後者的解釋，也就是階層為因，快不快樂、心理健康為果（Aneshensel, 1991: 18; Link et al., 1993）。根據這項解釋，階層越低者，由於資源有限，不但有越多機會面臨不快樂的事件，越難事先就加以避免，而工作條件較差，如缺少自主性，少有自由發揮的機會，在工廠、工地從事勞動工作，又容易遭遇危險緊張乃至不幸的事故；而且在發生事故後，又因為知識、財力、社會資源有限，無法有效地動用資源，如接受充份的健康、醫療服務，以減輕事件所帶來的痛苦；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高階層者的工作條件較佳，充滿自主性，有較多自由發揮機會，知識、財力、社會資源較豐富，不但可用來避免不快樂的事故或降低事故所帶來的痛

苦，也就較為快樂；這也就是說“階層越低，越不快樂，心理越不健康；階層越高，越快樂，心理越健康”（Aneshensel, 1991; 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 Kessler and Cleary, 1980; Link et al., 1993; Ross and Wu, 1995）。此外，階層越高，當也有越多資源可用來追求快樂的事件，如到國外旅遊，而提高心理的快樂。在此心理的快樂，不但直接關連到心理的健康，還會影響到身體的健康（Lin and Ensel, 1989; Ross and Wu, 1995: 723）。

以上用社會階層一個概念，很籠統地涵蓋了職業、收入，馬派（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以及教育等各個不同的階層面相；至於這些面相中，何者對於心理幸福有著最明顯的影響？有許多研究顯示教育所具有的淨響不但最穩定、最強健（robust）（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 354），也可以可是最重要（Davis, 1982: 581-585）。至於教育對快樂或心理健康的淨影響，若依 Ross and Wu（1995: 722-723）的

論點，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能力，也越相信能憑藉自己的行動來影響事情結果，而降低了疏離感中的“無力感”，並且有越多的社會支持以降低焦慮、憂鬱，這都提高了快樂程度。此外：教育程度越高者，往往知識越豐富，也就越能有效動用資源來避免不幸的生活事故，與降低事故所帶來的痛苦。

固然有許多西方社會的研究證實了社會階層會影響到心理幸福，階層越高，越快樂，心理越健康，然而仍不宜過度高估社會階層的影響大小。有許多西方社會的研究在探討社會階層，與工作滿意度（這可視為一項很重要的心理幸福）的關連時，就發現許多低階層者，如工人，雖然實際上的客觀工作條件很不理想，卻仍表示滿意；這可歸因於低階層者的心理調適（accommodation）過程：既然得不到上階層白領工作者特有的，如自主性與創造性，就降而

求其次，如收入過得去，與同事處得不錯，就可以了（Gruenberg, 1980）。在經歷心理調適的過程後，即使低階層者在許多客觀條件上並不理想，也可能主觀認定“生活過得還不錯”，社會階層對於心理快樂與健康的正面影響也就受到了限制，而可能不會太大。

至於在非西方社會的研究，根據林南（Lin and Gina, 1995: 1140）在中國大陸所作的研究，更是發現社會階層與心理健康的關連未達到統計顯著，而有重大關連的是社會關係之品質。又依林南和盧漢龍（1989）的研究，社會關係品質是影響中國大陸民眾生活滿意度與精神健康，這兩項心理幸福的很重要因素；而許多研究對於生活感受的解釋量偏低，當可歸因於沒有掌握重大的自變項“社會關係或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及用來代表網絡關係之強度的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House, et al., 1988），以及網絡結構中所蘊涵的社會資源（Social resource, Lin et al., 1981），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Coleman, 1988, 1990），及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Lin and Ensel, 1989），最近都在社會學界引起的廣汎關注。從關係網絡結構來分析人類社會行為，可說是具有十足社會學特色的研究取向，而有別於經濟學新古典主義人力資本論與心理學之原子化個人研究取向（Coleman, 1990; 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9）。在國內外，依網絡結構分析的研究取向，來探討社會階層化、企業組織、社區生活、家庭制度等具有社會學重大意義的主題，也已經給理論建構提供具備十足社會學特色之基礎（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Emirbayer and Goodwin, 1994; 熊瑞梅, 1995）；這特別是在 Granovetter（1973, 1985），Burt（1994），Coleman（1988, 1990），Blau（1977），以及林南（Lin et al., 1981; Lin and Ensel, 1989）等人幾篇重要著作對於網絡分析的理論啟發，與近年網絡

分析所用到的量化方法迅速進展相結合之後，依網絡分析的取向，來建構社會學理論，並在理論引導下進行經驗研究，已經成了熱潮！

依據 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12) 與 Emirbayer and Goodwin (1994: 1447-1448)，社會網絡可定義為一組連接著一組個體（人、團體、事、物）的社會關係；在網絡分析圖上，這些個體即節點（node），這些關係用連接著點的線來代表，即社會網絡。這也就是說：社會網絡所指的是社會關係，而非社會關係所連接的個體。不過在網絡分析上，固然社會關係很重要，關係所連接的個體之特質也很重要，如就找到好工作而言，本人與職業介紹人的關係固然重要，職業介紹人（個體）的職業地位也很重要，而代表著一項重要的社會資源變項（Lin et al., 1981; Lin, 1982）。

以本研究所關心的社會網絡或社會關係而論，它可區分為社會整合與關係的內容（relational content）：社會整合指的是關係的強度、頻率，而這關係的品質是好是壞就不是重點；關係的內容指的是關係的品質；如果關係的內容是正面的、能維持情感的，則為社會支持；如果關係的內容是負面的、強求的，則為緊張（strain）的關係（Umberson, 1996: 841）。

固然近年來量化的網絡分析廣受矚目，然而社會學家在理論建構上，用到網絡的概念來分析個人的生活感受，卻可追溯到涂爾幹的自殺論（Durkheim, 1951; Lin and Ensel, 1989: 382; 張荳雲, 1989: 204）。依據涂爾幹的論點，一個人的社會整合程度反映在所參與的社會互動頻率上，它會影響到心理幸福，進而影響自殺行為（Durkheim, 1951; Chandler and Tsai, 1992: 192-193）；此社會整合所涉及的社會互動頻率，也可用來代表 Granovetter (1973) 所說的連繫強度（Tie strength），即為當前社會網絡概念的重要面相

(Marsden, and Campbell, 1984; 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隨後有許多研究追隨著涂爾幹方向，進一步探討社會整合與心理幸福的關連；Chandler and Tsai (1992) 就進一步指出：整合程度越高者，越知足而快樂，進而降低自殺率。而另一與社會整合有密切關連的網絡變項“社會支持”，也被用來解釋生活感受。若依林南 (Lin and Ensel, 1989)，透過社會支持，社會結構中所具有的資源，會被動員起來以滿足日常或緊急情境之功能性需要，可提高個人的心理或生理之幸福，並降低生活事故對於幸福的不利影響¹。而有許多貫時性追縱調查研究又都已證實了“社會支持、社會整合都有增進心理幸福的作用” (House et al., 1988; Umberson, 1996)；社會支持、社會整合與心理幸福的正相關，不能祇用“心理幸福會提高社會支持、社會整合”來作解釋；而從社會整合所涉及的互動中，往往能得到社會支持，進而增進心理幸福 (House et al., 1988: 307-308)。相對而言，負面的緊張關係則不利於心理幸福 (Umberson, 1996: 839)。

從上述文獻探討可知，除了社會階層之外，社會網絡變項也是影響個人心理幸福之重要因素，當可預期一個人的社會整合程度越高，社會參與及互動越多，越有機會得到充份的社會支持，進而提高心理快樂與健康²。進而言之，在分析生活感受時，社會網絡變

¹ 依 Lin and Ensel (1989: 383) 的概念定義，社會支持為一過程，而不同於本研究所採用的 Umberson (1996: 841) 之定義，把社會支持視為正面的社會關係品質。無論如何，正面的社會關係，仍能促進社會支持的過程；而 Lin and Ensel (1989: 390)，在給社會支持做操作化定義時，仍由關係的品質著手；兩種不同的概念定義，基本上還是可以相通的。

² 根據以上的文獻回顧，社會階層越高、社會整合越佳者，越是快樂健康，部份可歸因於“不幸事故對於他們的傷害較小”，此即社會階層、社會整合與不幸事故對於快樂健康的影響具有交互作用 (interaction)；然而本研究所用到的兩筆社會變遷資料都欠缺對於“不幸事故”的適當測量，也就無法對此細緻的交互作用作檢證。

項與往往用來代表個人特質的職業、收入、教育等階層變項相較，實在又更具有重大的社會學意義。然而社會網絡及其相關的變項，如網絡中個體的特質，與社會階層又有著怎樣的關連？有許多研究指出，社會階層越高者，越容易與同樣是高階層者交往，求職時越能動用高地位介紹人（Lin, 1982, 1994），然而與高階層者交往是否會提高心理快樂，卻是很有疑問！不過仍有研究顯示社會階層越高者，有越大的社會網絡，與網絡成員互動越密，對組織活動的參與越多，此即社會整合的程度越高（House, et al., 1988: 312; Fischer, 1982），這很可能會有提昇心理快樂與健康的作用；換而言之，社會階層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有可能會以社會網絡變項中的社會整合為中介。

二、理論架構

依據先前的文獻檢討，可建立本研究的主要理論架構（因果模型）如下：



圖一：影響心理幸福因素之因果模型

圖中的社會網絡包括社會整合與緊張關係。在先前的文獻檢討，已很清楚地提出假設：很可能社會階層對於心理幸福的正面影響，以社會網絡變項中的社會整合為中介變項；而社會整合對於心理幸福的正面影響，可能又以另一個網絡變項“社會支持”為中介；然而本研究所用的資料缺乏社會支持的適當指標，因而在理論架構

上也沒列上社會支持。還有一個網絡變項“緊張關係”，固然也可提出假設，它對於心理幸福有負面的影響（Umberson, 1996: 839），然而它與社會階層究竟有何關係，卻仍不是很清楚，必須作過經驗分析後，方能作進一步討論，這也就是本研究較具探索性的一面。

至於主觀經濟狀況的影響，固然可提出假設“社會階層變項中的收入越高者，主觀經濟狀況越佳，因而心理也就幸福”；然而由於許多低階層者的心理調適過程（Gruenberg, 1980），社會階層對於主觀經濟狀況，與進一步的心理幸福之正面影響，可能就不會太大。此外，根據先前的文獻檢討，社會階層越高者，不但工作條件越佳，而且各方面的資源也越豐富，越能用來避免不快樂的事故與降低故所帶來的痛苦，因而心理也就越幸福；然而在這些社會階層影響心理幸福的因果過程中，有許多中介變項，如許多方面的工作條件與資源，本研究並沒作測量，因而可預期社會階層對於心理幸福，仍存在著直接影響³。

³ 至於以上理論架構中，並沒納入社會資本與成就動機這兩個中介變項，原因是：它們與理論架構（因果模型）中所有變項的關係，相關的理論文獻探討並不多，還不是很清楚它們在理論架構中的意義。如果一定要把它們當作中介變項納入統計分析，加入的中介變項越多，所估計的“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之直接影響”，可能就會越小；如此所估計的“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之直接影響”，可能會比本研究所估計的還小（可參分析方法）。

社會資本此一概念，在近年社會學研究裏，往往被用來對於“某些特定目標，特別是利益、成就之實現”作解釋；在階層化相關研究裏，它通常被當作“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因”，來作實證研究（Coleman, 1988, 1990; Lee and Brinton, 1996; Powell and Steelman, 1993; Hagan, et al. 1996; Sui-Chu and Willms, 1996; Downey, 1995; Teachman et al. 1997）；它也被用來解釋集體行動之目標實現（Hagan et al., 1995）；然而，並不容易看到它被用來解釋“心理幸福”，經常被用來解釋“心理幸福”的倒是社會支持（Umberson, 1996; House et al., 1988; Aneshensel, 1992）。社會支持和社會資本一樣，它們的關係內容都是正面的，都對個人有利（Coleman, 1988; Umberson, 1996: 841）；不過社會支持往往被用來解釋情感維持、心理幸福，這與社會資

三、本研究所運用之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研究根據「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作分析，這包括在民國 79 年進行調查的第二期第一次計劃問卷 II 資料，以及在民國 83 年進行調查的第二期第五次計劃問卷 II 資料。這兩項調查都針對 20-64 歲民眾作訪問，不但都採自全國性大樣本，而且都蒐集了許多有關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快樂、煩惱或心理健康所代表的心理幸福變項（瞿海源,1991, 1994）。不過本研究為了要比較階層變項，如職業、階級、教育及收入，與社會網絡變項，對於心理幸福影響之相對大小，乃把所分析的樣本限定於“目前的就職者”。

(二) 變項測量

1. 背景變項

(1) 父親職業：兩項調查資料都根據測量較細的 Treiman (1977) 三分位國際聲望量表作測量。

(2) 父、母教育：參考各級教育修業年數，將原屬順序尺度的教育測量，轉換成所接受的學校正式教育年數，以進行測量，使其合乎迴歸分析的尺度設定。

(3) 性別：在進行迴歸分析時做虛擬變項，以男性為 0，女性為 1。

(4) 籍貫：分為本省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共四類，在迴歸分析時做虛擬變項。

本被用來解釋利益、成就之實現，有所不同。

(5) 出生年次：以受訪者所回答的民國出生年次作測量。

2. 現居地：以受訪者現居都市化程度為指標，並根據行政院主計處（1983）的「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把都市化程度分成 1-8 共八個等級，數值越高，代表都市化程度越高。

3. 本人社會階層：包含教育、現職與收入這三項通常所謂客觀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馬派（馬克思主義）的客觀階級位置。

(1) 教育：同父、母教育之測量。

(2) 現職：把本人現職分成專門技術人員，行政主管人員，監督佐理人員，買賣工作人員，服務工作人員，勞動工人，以及農林漁牧獵人員共七類；在作迴歸分析時，依此做六個虛擬變項，以對本人的社會網絡等中介變項，以及心理幸福變項作預測⁴。

(3) 全家收入：嚴格來說，這兩項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收入都屬於順序尺度（可參見調查問卷），數值越大，則收入越高。

(4) 馬派階級位置：若依 Wright 等人（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1979）的階級分類，可根據是否為自己工作，是否有雇人，以及是否管理其他員工，這三項指標把就業的民眾區分成四項階級位置：1. 資本家：為自己工作，且僱人；2. 小資本家：為自己工作，但沒僱人；3. 經理：不為自己工作，沒僱人，但能管理其他員工；4. 工人：不為自己工作，沒僱人，而且不能管理其他員工。然而本研究所用到的 79 年與 83 年兩項社會變遷資料，都少了”是

⁴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本人現有的客觀社會階層，與社會網絡變項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為了要詳細地比較不同現職的心理幸福之差別，也就用了六個虛擬變項來代表七大類現職，而不用單一的職業聲望（或社經地位）來代表現職；因為兩項職業即使聲望一樣，如白領的圖書管理助理與藍領的印刷工聲望一樣都是 41 分（Treiman, 1977: 244, 256），很可能其心理幸福，還是會因為大類職業所區隔出來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方式之不同（如藍白領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不過在本研究中，父親職業僅作控制變項之用；為了要簡化進一步的多變量分析，父親職業也就僅以一個 Treiman 國際聲望作測量，否則分析會變得很複雜。

否管理其他員工"之指標，不能區分出是經理或工人，而僅能依Wright的分類區分出資本家，小資本家，與同樣不為自己工作的經理或工人三類；本研究並把台灣社會所特有的為家裏工作之家屬工作者，獨立歸成一類，仍得到四類；在作迴歸分析時，依此做三個虛擬變項。

4. 婚姻狀況：把受訪者的婚姻狀況分成(1)未婚；(2)與配偶離異，含離婚，分居，或配偶去世的已婚者（簡稱離異）；以及(3)未離異的已婚者（簡稱已婚）；共三類。

以上變項通常稱為人口階層變項，其中本人社會階層為本研究主要的自變項；在隨後的分析中，其餘的人口階層變項主要作統計控制之用，如果沒有必要，不會對於它們的影響作太多說明與討論。

5. 社會網絡

(1) 鄰里關係：79年的資料有"您有多少熟識的鄰居，彼此會到對方家裡坐坐聊聊"，以及"在這個社區裡大家的關係之密切程度"兩個變項可用來代表鄰里關係的強度。本研究以主成份分析抽取因素（取 λ 值大於1），得到抽一個因素，可命名為鄰里關係，因素分越高，代表關係越強；以此因素分數作為進一步的迴歸分析之基礎⁵。而83年的資料亦有"您住的這個社區裡，鄰居之間相處如何"之變項，本研究以回答"彼此會照顧，像是自己人"為4，"彼此有些往來，偶而會互相照顧"為3，"彼此往來不多"為2，"彼此很少往來，很陌生"為1，數值越大，代表關係越強。

(2) 親戚關係：79年的資料有"您和您的親戚多久聚會一次"之變項，本研究以沒有為1，很少為2，-----，一個禮拜兩次以上為6，

⁵ 進一步的分析直接把這兩個變項加起來，用來代表整個鄰里關係的密切程度，以作為迴歸分析的基礎，仍然不改結果。

數值越大，代表互動頻率越密。

(3)朋友關係：79年的資料有“您和朋友有沒有常常相約聚會”之變項，本研究以沒有為1，很少為2，-----，一個禮拜兩次以上為6，數值越大，代表互動頻率越密。

(4)社團參與：79年的資料有“您參加了下列團體中的那些？1.宗親會，2.職業團體，3.宗教團體，4.同鄉會，5.康樂團體，6.校友會，7.祠堂，祭祀公會，8.政治團體（如政黨），9.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10.其他團體”；本研究以所參加的團體項數，來代表從社團所建立的網絡大小與社會互動頻率。

(5)社區活動參與：83年的資料有“您在過去一年中，參加了下列社區活動中的那些？1.康樂活動，2.聯誼活動，3.旅遊活動，4.體育活動，5.文化活動，6.公益活動，7.宗教活動，8.其它”；本研究以所參加的活動團體項數，來代表從活動所建立的網絡大小與社會互動頻率。

以上社會網絡變項(1)至(5)都可反映出社會整合的程度⁶

⁶ 依據 Umberson (1996: 841)，參加社團、社會活動，與親友、鄰居相聚，到對方家裡拜訪，都祇能說是社會整合，還不能代表社會支持；以上網絡變項(1)至(5)當都祇能代表社會整合，而非社會支持。不過變項(1)於83年的指標為“您住的這個社區裡，鄰居之間相處如何”，本研究以回答“彼此會照顧，像是自己人”為4，“彼此有些往來，偶而會互相照顧”為3，“彼此往來不多”為2，“彼此很少往來，很陌生”為1；4個選項中有3個明顯測到往來頻率，數字越高，主要代表頻率越高，社會整合越高；不過也有2個選項測到“照顧”，當也測到社會支持；不過整體而言，它所測的當仍以社會整合為主。

或許細心的讀者仍會覺得它所測的應是社會支持，在理論架構上，它應列在社會整合與心理幸福之間，而為已找到指標之中介變項。然而就這個理論架構而言，79年的資料並沒社會支持的適當指標，83年的資料也勉強祇有上述“鄰居之間相處”一個指標，資料實在太弱了。更何況本研究曾以“鄰居之間相處”為社會整合與心理幸福之中介變項，對於83年資料所作的進一步分析又顯示：83年資料唯一的社會整合指標“社區活動參與”，對於“鄰居之間相處”的影響實在很小（ $\beta = .11$ ），並沒多大實質意義；固然社區活動參與，會影響到從參與成員裏得到的社會支持，然而很可能有許多鄰居並非熱衷的參與者，自然社區活動參與，對於“鄰居之間相處”的影響就不會有多大。因而在本研究理論架構

(6)家庭關係：79 年的資料有您家裡是不是符合“常有爭吵”，“當您的事情對別人重要時，他們才會關心您”，“常覺的家裡的氣氛不對勁”，共三個問題可用來代表大多數的受訪者（含未婚者）所處的家庭關係好壞。本研究以這三題回答非常符合者給 1，符合給 2，無意見給 3，不符合給 4，非常不符合給 5，來作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抽取因素（取 λ 值大於 1），得到抽一個因素，可命名為家庭關係，因素分數越高，代表關係越好；在進一步的迴歸分析時，以此因素分數為自變項或依變項，以收簡化分析之效。

(7)人際關係：83 年資料有“總的來說，您覺得目前您和別人相處有沒有困擾”之問項，本研究以沒甚麼困擾為 1，不太困擾為 2，有些困擾為 3，很困擾為 4，數值越高，代表有越多負面的人際關係。這個變項，固然可直接用來代表主觀的心理感受，卻仍與結構面的社會網絡或關係有著密切的關連，仍可作為結構面的負面關係之指標。

以上社會網絡變項(6)至(7)都可反映出關係內容或品質，而都可代表緊張的關係。

6.主觀經濟狀況：83 年的資料有“您覺得目前您經濟狀況好嗎？”的問項，本研究以回答者很不好為 1，不太好 2，好 3，很好 4，來測量主觀經濟狀況，數值越高，代表主觀經濟狀況越佳；然而 79 年的資料並沒主觀經濟狀況的指標。在上一節本研究主要理論架構中的所有變項，幾乎都可在本研究所運用的 79 年與 83 年資料中，分別找到指標，唯一的例外是：架構中的主觀經濟狀況，祇能在 83 年的資料中找到指標。

上，也就不以“鄰居之間相處”代表社會支持，並把它列在社會整合與心理幸福之間作為中介變項；不然的話，模型會變得較複雜，卻又資料不足，並沒多大的實質意義。而祇是以“鄰居之間相處”代表社會整合，以簡化分析。

7.生死意義所代來的心理困擾：根據 83 年的資料，以“過去一年裏從未想過人活在世上的意義或有關死亡的事，或者雖想過，但沒甚麼困擾”者為 1；曾想過，而不太困擾為 2；有些困擾為 3；很困擾為 4；數值越高，代表心理困擾越大。

由於變項 7 與前述因果模型中的變項之關係，相關的理論文獻探討並不多，也就不在因果模型中列出這個變項。不過變項 7 仍可代表著一項有壓力或緊張（stressful）的生活經驗，與心理幸福當有負向的關係（Aneshensel, 1992:18），這跟網絡變項“緊張關係”的作用當很類似；然而它與社會階層究竟有何關係，卻仍不是很清楚，必須在作過資料分析後，才能作說明；這也是本研究最具探索性的一面。

8.整體的快樂、煩惱程度：83 年的資料有“整體來說，您覺得目前生活過得快樂嗎？”，本研究以答很不快樂為 1，不太快樂為 2，還算快樂為 3，快樂為 4，很快樂為 5，數值越高，代表越快樂。83 年的資料另有“您覺得目前有沒有甚麼煩惱？”，本研究以答沒煩惱為 1，煩惱很少為 2，有一些煩惱為 3，煩惱很多為 4，數值越高，代表越煩惱。

9.心理健康問題：79 年的資料有“請問您最近兩星期以來會不會：

- (1)覺得頭痛或頭部緊緊的？
- (2)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擔心可能得了心臟病？
- (3)感到胸部緊緊的，很不舒服？
- (4)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 (5)覺得睡不好？
- (6)覺得許多事情對您來說是個負擔？
- (7)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 (8)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 (9)覺得緊張不安，無法放鬆？
- (10)覺得家人或親友會令您擔憂？

本研究把各題答“一點也不會”者，視為沒有那一方面心理健康的問題；並把答“和平時差不多”，“比平時還覺得”，以及“比平時更覺得”者，視為有問題；而有問題的總項數即反映出整體的心理健康，項數越多，代表心理健康越有問題；根據上述十項問項的內容，也可以用來代表不快樂的程度。

以上 8.整體的快樂、煩惱程度，與 9.心理健康問題的總項數，都能反映出一般性的心理幸福，而都是本研究最後所要解釋的依變項。⁷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在基本資料分析中，以單變項分析，說明三個心理幸福依變項的次數分佈；並以雙變項分析，比較本研究主要自變項“本人社會階層”的不同類別在這些依變項上的均數之差異；隨後即在圖 1 的因果模型的引導下作迴歸分析，並檢證相關假設，可說是參照了路徑分析的架構。

在此以心理幸福為依變項的迴歸分析中，本研究先以人口階層變項為自變項，其中本人社會階層為本研究所要分析的主要自變項，其餘的人口階層變項主要作統計控制之用；在此迴歸模型中，

⁷ 和本研究一樣，Rosenberg et al. (1995) 的心理幸福，也涵蓋了“快樂”，與許多負面的“不快樂”或“心理健康問題”之面向。由於本研究的心理幸福所涵蓋的整體“快樂”、“煩惱”與“心理健康問題”，這三者彼此之間是具有著因果關係，或者僅是同一個概念的不同面向、不同測量而已，並不容易弄清楚；為了避免過度的因果推論，本研究也就參考 Rosenberg et al. 的作法，這三者都是本研究最後所要解釋的依變項，而不分析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並未加入社會網絡等中介變項，即為簡約模型（reduced model），它可顯示出本人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總影響。接著加入社會網絡等中介變項，得到完整模型（full model），它可顯示中介變項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以及本人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直接影響；總影響與直接影響的差，則可視為本人社會階層透過社會網絡等中介變項，而對於心理幸福的間接影響。至於本研究所要比較的本人社會階層與社會網絡之影響大小，則根據簡約模型所顯示的本人社會階層總影響，與完整模型所顯示的社會網絡影響作比較；在一般情況下，總影響會大於直接影響，如果社會階層的總影響小於社會網絡的影響，完整模型所顯示的社會階層之直接影響，就會比社會網絡的影響小得更多。此外，參考一般路徑分析的程序，本研究除了如上述以心理幸福為依變項作分析外，也要以人口階層變項為自變項，社會網絡等中介變項為依變項作迴歸分析。

四、研究發現與解釋

（一）基本資料分析

就民國 83 年的台灣地區受訪民眾而言，從表一 A 可看到，有一半以上回答“整體來說，目前生活過得很快樂或快樂”（合佔 56.6%，其餘大都回答“還算快樂”（佔總數 38.5%），回答不太快樂或很不快樂的僅佔 4.2%。很可能就多數人而言，即使實際的生活狀況不是很好，經過一番心理調適後，至少也會變得還算快樂，乃至於快樂。再看看表一 B。“您覺得目前有沒有煩惱”，回答“沒煩惱或煩惱很少”的為數亦不少（合佔 42.4%），回答煩惱很多的並不多（佔 6.7%），一半的受訪者回答“有一些煩惱”。至於用來探討民眾心理健康問題的十個項目中，民國 73 年的受訪民眾平均回答 3.3

表一：各心理感受變項次數分佈

A. 整體來說，您覺得目前生活過得快樂嗎？		
	樣本數	百分比
很不快樂	5	.4
不太快樂	52	3.8
還算快樂	525	38.5
快樂	524	38.4
很快樂	248	18.2
不知道、未答 或不願回答	9	.7
總計	1363	100.0

資料來源：民 83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

B. 您覺得目前有沒有甚麼煩惱？

	樣本數	百分比
沒煩惱	285	20.9
煩惱很少	293	21.5
有一些煩惱	691	50.7
煩惱很多	91	6.7
不知道、未答 或不願回答	3	.2
總計	1363	100.0

資料來源：民 83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

C. 心理健康有問題的項數：

項數	樣本數	百分比
0	337	20.8
1	255	15.7
2	202	12.5
3	181	11.2
4	132	8.1
5	142	8.8
6	96	5.9
7	79	4.9
8	63	3.9
9	47	2.9
10	78	4.8
缺資料	8	.5
總計	1620	100.0

平均項數 3.3 標準差 3.0

資料來源：民 79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

項，半數的受訪者有問題的項目在兩項以下，完全沒有問題的（0項）的受訪者佔總數五分之一；不過十項全部有問題的也佔了4.8%。

在說明過本研究的三個依變項之次數分佈後，接著說明各個階層變項與它們的雙變項關連性。根據本研究所做的分析，幾乎所有的階層變項與"生活快樂"及"心理有問題的項數"之關連都未達統計顯著（ $P>0.05$ ，表略），既然"快樂與否"往往是經歷心理調適過程後的結果，階層較低的也就不一定比較不快樂，這些關連性之所以未達統計顯著，也就可以理解了；唯一的例外是全家收入越高，越是快樂（ $P<.05$ ，見表二.A）。不過"目前有沒有煩惱"與職業、階級、教育及全家收入的關連性，在大樣本（ $N=1360$ ）的情況下還是達到顯著（見表二.B）；各現職者中以買賣工人員的煩惱最多，農民煩惱最少；各階級中，以同樣是沒有生產工具而受雇於人的經理或工人煩惱最多，小資本案煩惱最少；而教育程度、全家收入越高者，煩惱也就越多。不過上述四個階層變項與"煩惱程度"的關連性都不是很強，Eta 最高也不過為.16。在進一步的多變項分析作適當控制後，是否原有關連性還會達到顯著，仍有待進一步檢證。

表二 A 全家收入與快樂程度關連性均數分析

全家每月收入	M	S.D.	N
整体	3.7	.81	1239
三萬元以下	3.6	.88	233
三至六萬元	3.7	.79	520
六至十萬元	3.7	.78	310
十萬元以上	3.9	.80	176
均數差異 P 值	.01		
ETA	.10		

表二 B 各階層變項與煩惱程度關連性均數分析

整體	M	S.D.	N				
	2.4	.89	1360				
職業				階級			
	M	S.D.	N		M	S.D.	N
專門技術人員	2.5	.81	161	資本家	2.4	.93	244
行政主管人員	2.3	.80	39	經理或工人	2.5	.87	879
監督佐理人員	2.5	.85	231	家屬工作者	2.4	.85	46
買賣工作人員	2.6	.88	220	小資本家	2.3	.95	191
服務工作人員	2.5	.86	126				
勞動工人	2.4	.93	428				
農林漁牧獵人員	2.0	.91	155				
各類現職均數差異 P 值	.00			均數差異 P 值	.01		
ETA	.16			ETA	.09		
教育				全家每月收入			
	M	S.D.	N		M	S.D.	N
小學以下	2.2	.96	413	三萬元以下	2.3	.94	236
國初中	2.4	.89	211	三至六萬元	2.4	.90	521
高中職	2.5	.88	408	六至十萬元	2.5	.89	310
大專以上	2.6	.79	327	十萬元以上	2.6	.79	176
均數差異 P 值	.00			均數差異 P 值	.00		
ETA	.16			ETA	.10		

(二) 心理幸福迴歸分析

本節針首先對於整體的"生活快樂"與"煩惱"兩個心理幸福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從表三"生活快樂"方程式(1)，可看到在所有人階層變項中，僅有全家數入、外省以及已婚的影響達到顯著，然而影響均不大，以全家收入的影響最大， β 亦不過為.11，整個模型的解釋力 R square 也不過祇有.04。全家收入的影響為正，代表收入越高越快樂，這是唯一有顯著影響的本人社會階層變項；其餘

兩個社經地位變項"教育"與"職業"，以及階級變項的影響都不顯著。至於已婚者比未婚者快樂 ($P < .05$)，這可很能是因為已婚者有較強的社會整合或親密網絡（與配偶連結）所致（Chandler and Tsai, 1992: 199）；至於外省籍則比本省閩南不快樂 ($P < .05$)。

方程式(2)加入主觀經濟狀況、鄰里關係與參與社團活動的項目，三個變項的影響都為顯著的正值；主觀經濟狀況越佳，鄰里關係越佳，所參與的社團活動越多，越感到快樂。加入這三個變項後，R square 就提高為.15，提高得相當多，這反映出影響快樂與否的關鍵不在於客觀階層高低，而在於主觀對於經濟狀況好壞的認定與社會網絡。在新加入三個變項以後，已婚及外省的影響變得不顯著，全家收入的影響雖然仍舊顯著，然而卻也減少了三分之一；隨後的分析會進一步解釋這些變項對於快樂影響的可能因果機制。

方程式(3)又加入了"人際相處困擾"及"生生意義之困擾"，這兩方面的困擾越多，越不快樂 ($P < .05$)；人際相處的困擾可反映出不良的網絡關係品質，這又反映出社會網絡對於快樂與否的重要性。在加入這兩個變項後 R square 又提高為.21。整個模式中，階層變項僅有全家收入影響達到顯著，不過影響並不大 ($\beta = .08$)，鄰里關係 ($\beta = .10$)、社區活動 ($\beta = .09$)、人際相處 ($\beta = -.18$)，三個有關網絡的變項影響就顯得比較重要⁸；即使用簡約模式(1)的

⁸ 到了方程式(3)才加入"人際相處困擾"及"生生意義之困擾"，而不在式(2)就加入，原因是："生生意義之困擾究竟是整體快樂或煩惱的因，或者僅是整體快樂或煩惱的一項成份而已，而不是因，並不容易弄清楚"，因而就不在式(2)中與其它當可視為"因"的變項一起加入；至於"人際相處困擾"，固然仍可作為結構面的負面關係之指標，可視為整體快樂或煩惱的因，不過它可能也會直接地反映在"人際相處的心理幸福上"，而為整體快樂或煩惱的一項成份，因而也就到了方程式(3)才加入。不過即使它們僅能當作一項成份而已，仍然有助於分析整體快樂或煩惱；如在隨後的分析中，會討論到"教育程度越高，對於對於生生意義的困擾越大，進而提高整體煩惱"的發現，這可解釋為教育程度越高，書讀得越多，想得越多，也就提高困擾與煩惱。

表三：生活感受迴歸分析

	生活快樂 (1)	生活快樂 (2)	生活快樂 (3)	煩惱 (1)	煩惱 (2)	煩惱 (3)
已婚	b=.15*(β =.08)	.06(.03)	.01(.01)	-.15*(-.07)	-.06(-.03)	.01(.00)
離異	-.09(-.02)	-.05(-.01)	-.07(-.02)	.10(.02)	.06(.01)	.10(.02)
女性	-.03(-.02)	-.04(-.02)	-.01(-.01)	-.02(-.01)	.02(.01)	-.02(-.01)
本省客家	.13(.06)	.12(.05)	.11(.05)	.03(.01)	.04(.01)	.04(.02)
外省	-.15*(-.06)	-.07(-.03)	-.03(-.03)	.13(.05)	.05(.02)	.05(.02)
原住民	.16(.03)	.08(.01)	.16(.03)	-.12(-.02)	-.11(-.02)	-.22(-.04)
出生年次	.00(.00)	.002(.03)	.003(.04)	.012*(.14)	.010*(.11)	.009*(.10)
現居地	-.01(-.04)	-.004(-.01)	.01(.01)	.04*(.09)	.03*(.08)	.02(.05)
現專門技術人員	.02(.01)	.01(.00)	.06(.02)	-.08(-.03)	-.06(-.02)	-.13(-.05)
行政主管人員	.11(.02)	.10(.02)	.10(.02)	-.21(-.04)	-.20(-.04)	-.20(-.04)
監督佐理人員	-.06(-.03)	-.07(-.03)	-.03(-.01)	.02(.01)	.03(.01)	-.03(-.01)
買賣工作人員	-.13(-.06)	-.09(-.04)	-.07(-.03)	.11(.04)	.09(.04)	.06(.02)
服務工作人員	.01(.00)	-.04(-.01)	-.04(-.01)	.00(.00)	.04(.01)	.04(.01)
農林漁牧獵人員	.09(.04)	.03(.01)	.03(.01)	-.13(-.05)	-.07(-.03)	-.08(-.03)
現資本案	.04(.02)	.01(.01)	.02(.01)	.00(.00)	.04(.02)	.04(.01)
小資本案	.03(.01)	-.09(-.04)	-.07(-.03)	.03(.01)	.00(.00)	-.02(-.01)
家屬工作者	.03(.01)	-.02(.00)	.07(.02)	-.02(.00)	-.02(.00)	-.07(-.01)
教育年數	.01(.03)	-.01(-.03)	.00(.02)	.00(.01)	.01(.07)	.00(.02)
全家收入	.23*(.11)	.015*(.08)	.016*(.08)	.04(.02)	.01(.06)	.01(.06)
主觀經濟狀況		.49*(.30)	.41*(.25)		-.52*(-.29)	-.41*(-.23)
鄰里關係		.13*(.13)	.10*(.10)		-.05(-.05)	-.21(-.02)
參與社區活動		.07*(.07)	.08*(.09)		-.01(-.01)	-.02(-.02)
人際相處之困擾			-.18*(-.18)			.25*(.22)
生死意義之困擾			-.14(-.14)			.18*(.16)
常數項	3.5*	1.8*	2.4*	1.8*	3.2*	2.4*
Rsquare	.04	.15	.21	.07	.15	.24
N	1204	1196	1196	1208	1199	1199

說明：*表 $p < .05$

表三：生活感受迴歸分析（續）

	主觀經濟狀況	鄰里關係	社區活動之參與	人際相處之困擾	生生意義之困擾
已婚	b= .14*($\beta = 12$)	.06(.03)	.06(.03)	-.02*(-.11)	-.20(-.11)
離異	-.06(-.02)	-.21(-.05)	.00(.00)	-.08(-.02)	-.03(-.01)
女性	.07*(.07)	-.09(-.05)	-.16*(-.09)	.01(.00)	.13*(.08)
本省客家	.00(.00)	-.09(-.04)	.03(.01)	-.09(-.04)	.24(.04)
外省	-.13*(-.09)	-.06(-.03)	-.18*(-.07)	.03(.01)	.04(.02)
原住民	.09(.03)	.14(.03)	.43*(.07)	.22(.04)	.24(.04)
出生年次	-.004*(-.08)	-.005*(-.07)	-.005(-.06)	.005(.06)	.00(.01)
現居地	.00(.01)	-.05*(-.14)	-.02(-.04)	.04*(.10)	.03*(.07)
現專門技術人員	.05(.03)	-.16(-.07)	.03(.01)	.08(.03)	.27*(.11)
行政主管人員	.03(.01)	-.18(-.04)	.03*(.06)	-.11(-.02)	.20(.04)
監督佐理人員	.04(.03)	-.16*(-.08)	-.04(-.02)	.15*(.07)	.13(.06)
買賣工作人員	-.02(-.02)	-.24*(-.11)	-.07(-.03)	.08(.03)	.11(.05)
服務工作人員	.06(.03)	.01(.00)	.13(.04)	-.02(-.01)	-.03(-.01)
農林漁牧獵人員	.11(.07)	-.06(-.03)	.06(.02)	-.06(-.03)	.07(.03)
現資本案	.07(.05)	.07(.03)	-.03(-.01)	-.02(-.01)	.10(.00)
小資本案	-.06(-.04)	.04(.02)	.12(.05)	.13(.06)	-.05(-.02)
家屬工作者	-.01(.00)	.18(.04)	-.05(-.01)	.16(.04)	.03(.01)
教育年數	.03*(.23)	-.02*(-.10)	.02*(.12)	.02*(.11)	.02*(.12)
全家收入	.02*(.14)	-.01(-.04)	.00(.00)	.00(.01)	-.01(-.05)
常數項	2.4*	4.0*	.56*	1.0*	1.1*
Rsquare	.11	.13	.04	.09	.08
N	1210	1201	1210	1210	1210

說明：*表 p<.05

全家收入總影響 ($\beta = .11$)，與式(3)的網絡變項之影響 (β) 作比較，整體而言，網絡變項的影響仍然顯得大多了。

在說明過各階層變項與社會網絡變項對於快樂的相對影響後，接著說明生活快樂式(1)中，各人口階層變項對於快樂的影響之可能因果機制。從表三（續）可看到，已婚者有較高的主觀經濟狀況，並有較低的人際相處與生死意義之困擾 ($P < .05$)，這都有助於提昇快樂。外省籍則有較低的主觀經濟狀況（控制全家收入），較少參與社區活動 ($P < .05$)，這都會降低快樂程度。而客觀的全家收入越高，則主觀經濟狀況越佳 ($p < .05$)，這會提高快樂程度；不過客觀的全家收入對於主觀經濟狀況的影響並不大 ($\beta = .14$)，透過提高全家收入，來增進主觀經濟狀況，而對快樂程度的間接影響也就不大；全家收入提高，快樂程度並不會跟著提高多少，這已見於生活快樂方程式(1)。

至於教育年數對生活快樂的影響，雖然生活快樂式(1)並沒顯示教育有所影響，然而從表三（續）卻可看出教育並非全無影響，而祇是教育對於快樂許多正面與負面的影響相互抵銷，而看不出整體的影響所致。更詳細地說，隨著教育年數提高，會提高主觀的經濟狀況與社區活動之參與 ($p < .05$)，這有提高快樂的作用；不過也降低了鄰里關係，並提高人際相處與生死意義的困擾 ($P < .05$)，這都有降低快樂的作用；教育對快樂有著正反兩面的作用，也就顯示不出整體的影響。

在分析過人口階層變項、網絡變項與生活快樂的關連性之後，接著再分析它們與“煩惱”程度的關連。從表三“煩惱”簡約模式(1)可看出：所有的階層變項對於煩惱的影響都不顯著，有顯著影響的僅有已婚會降低煩惱程度，出生年次越高煩惱也就越多，現居地都市化程度越高，煩惱也會越多；然而這三個變項的影響力都不大，以

出生年次的 β 最高，也不過為.14，整個模式的解釋 R square 也就祇有.07。在式(2)加入主觀經濟狀況、鄰里關係、參與社區活動之後，R square 提高為.15；R square 提高的主要來源當是“主觀經濟狀況”，它不但達到顯著影響，而 β 高達-.29，主觀經濟狀況越佳，則煩惱越少，它的影響為所變項有中最強者；至於鄰里關係與參與社區活動這兩個有關社會網絡的變項，雖然對前面所分析過的“生活快樂”有相當程度的正面影響，然而在此對於“煩惱”程度的影響卻未達到顯著，網絡密或整合強，並不一定會降低煩惱。在式(3)中又加入了人際相處之困擾、生死意義之困擾兩個變項，這兩個變項的影響都達到顯著，這兩方面的困擾越多，則整體的煩惱程度越高，其中人際相處之困擾的影響力(β)更高達.22，這可反映出不良的網絡關係會增加煩惱的程度；在加入這兩個變項後 R square 又提高到.24。在此式(1)至(3)以“煩惱”程度為依變項的分析，仍顯示網絡變項的影響大於階層變項。

在以上“煩惱”式(1)中，已婚、出生年次與現居地對煩惱有顯著的影響，在式(2)、(3)陸續加入五個變項後，已婚、現居地的影響就變得不顯著，出生年次的影響也減少了一些，很可能這三個人口變項的影響以新加入的變項為中介，接著依表三（續）來分析這些影響的可能因果機制。

從表三（續）可看到已婚者比未婚者有較佳的主觀經濟狀況，以及較少的人際相處與生死意義的困擾（ $P<.05$ ），這都降低了整體的煩惱程度；在控制客觀的全家收入之情況下，出生年次越高者，而年齡越輕者，主觀經濟狀況越差（ $p<.05$ ），而提高了煩惱程度。至於教育年數之影響，教育年數越高，不但會因為主觀經濟狀況較佳而降低煩惱，也會因為人際相處與人生意義的困擾較多（ $P<.05$ ），而提高煩惱；這有正有反的作用相互抵銷，也就看不出

表四：心理健康問題迴歸分析

	心理健康問題 (1)	心理健康問題 (2)	家庭關係	鄰里關係	親戚關係
已婚	b=-.24(β = -.04)	.01(.00)	.13(.06)	-.03(-.01)	.17(.06)
離異	-.21(-.02)	-.29(-.02)	.01(.00)	-.20(-.04)	.19(.03)
女性	.69*(.11)	.65*(.11)	.04(.02)	-.23*(-.11)	.08(.03)
本省客家	-.09(-.01)	-.16(-.02)	-.11(-.04)	.07(.03)	-.01(.00)
外省	-.23(-.03)	-.15(-.02)	-.01(.00)	.00(.00)	.15(.04)
原住民	-.55(-.02)	-.82(-.02)	.07(.01)	.23(.02)	.06(.00)
出生年次	-.018(-.063)	-.01(-.04)	.003(.03)	.00(.00)	.007(.06)
現居地	.09(.06)	.04(.03)	-.03(-.06)	-.13*(-.28)	.02(.03)
現專門技術人員	.27(.03)	.40(.05)	.14(.05)	-.02(-.01)	-.12(-.03)
行政主管人員	.30(.21)	.29(.02)	.11(.05)	.00(.00)	.26(.04)
監督佐理人員	-.11(-.01)	.00(.00)	.13(.05)	.01(.00)	.09(.03)
買賣工作人員	.22(.03)	.09(.01)	-.04(-.02)	-.01(.00)	-.13(-.04)
服務工作人員	.17(.02)	.17(.02)	.00(.00)	-.18(-.05)	-.27(-.06)
農林漁牧獵人員	-.07(-.01)	.01(.00)	.25*(.08)	.11(.04)	.04(.01)
現資本家	-.32(-.04)	-.27(-.03)	.07(.02)	-.07(-.02)	.29*(.08)
小資本家	-.14(-.02)	-.10(-.01)	-.06(-.02)	.09(.03)	.10(.03)
家屬工作者	-.31(-.03)	-.21(-.02)	-.22(-.06)	.09(.02)	-.03(-.01)
教育年數	.04(.06)	.04(.05)	.02(.06)	-.04*(-.16)	.02(.06)
全家收入	-.149*(-.06)	-.124(-.05)	.01(.01)	.02(.03)	.03(.04)
家庭關係		-.45*(-.15)			
鄰里關係		-.31*(-.11)			
親戚關係		-.14*(-.06)			
朋友關係		-.04(-.02)			
社團參與		.06(.02)			
常數項	2.86*	3.03*	-3.40*	1.39*	2.17*
Rsquare	.028	.075	.02	.19	.03
N	1346	1261	1272	1353	1354

說明：*表 $p < .05$

教育的整體影響了。

在分析過整體的生活快樂與煩惱之後，接著再依表四來分析受訪者心理健康有問題的項數；項數越多，代表問題越多或越不健康。首先從心理健康問題簡約模式(1)可看到，在大樣本的情況下，有顯著影響的自變項仍然僅有"女性的問題較多"，以及"全家收入越多，問題越少"，然而 β 都不大，整個模式的解釋力 R square 也就祇有.028；教育、職業、階級等重要的階層變項之影響，在大樣本的情況，仍然都達不到顯著，而全家收入之影響固然達到顯著，不過 β 也僅有-.06。在式(2)加入了家庭關係等五個社會網絡變項後，R square 即提昇到.075。這五個新加入變項中，家庭關係越佳，鄰里關係越密，以及親戚關係越密，都會顯著降低心理健康的問題，其中又以家庭關係的影響最大 ($\beta = -.15$)，鄰里關係居次 ($\beta = -.11$)，親戚關係第三 ($\beta = -.06$)；然而朋友關係與社團參與的影響都未達顯著。在此式(1)、(2)的分析中，又顯示網絡變項的影響大於階層變項。

既然家庭關係、鄰里關係以及親戚關係都會影響到心理健康的問題，究竟有那變項會影響到這三個網絡變項也就值得探討。從表四可看到農林漁牧獵人員有較佳家庭關係 ($P < .05$)，而有助於心理健康；教育年數、現居地都市化程度較高者，以及女性的鄰里關係較淡薄 ($P < .05$)，而不利於心理健康；資本家的親戚關係較密 ($P < .05$)，則有利於心理健康。固然這些階層人口變項對於三個網絡變項的影響都達到顯著，然而影響大都不是很大，透過對於網絡的影響，而間接影響到心理健康的作用也就相當有限，因而心理健康式(1)所呈現的這些變項之影響，也就大都達不到顯著。前面表三(續)上面的階層人口變項對於網絡變項的影響之情況，也與表四類似；這些網絡變項包括了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與階層人口變

項的關連都不大。

五、結論與討論

就台灣地區民眾而言，一個人的教育、職業、收入，以馬派階級位置所代表的本人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這包括整體的快樂、煩惱程度以及相關的心理健康，可說是沒有多大的關連；低階層的人並不會由於知足而快樂一些，而降低煩惱，並減少心理健康問題；相對而言，高階層者也不會因為工作的條件較佳，資源較多，而增加多少快樂，降低煩惱，以及減少心理健康問題。

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的整體關連雖然不是很強，然而並不能說社會階層對於心理幸福完全沒有影響，而有可能是影響很複雜，同時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相互抵銷，而看不出整體的影響，這種情形以教育的影響最為明顯：隨著教育提高，會提高主觀的經濟狀況與社區活動之參與，這有提高快樂、降低煩惱的作用；不過也降低了鄰里關係，並提高人際相處與對於人生意義的困擾，這有降低快樂、提高煩惱的作用；教育對快樂有著正反兩面相互抵銷的作用，也就顯示不出教育的整體影響。若要透過提高個人的社會階層與生活機會，來追求快樂、降低煩惱，以及改善心理健康，效果將會非常有限。

就台灣地區民眾而言，與心理幸福的整體關連較強的，主要是個人社會網絡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以及主觀的經濟狀況；此社會整合，包括鄰里關係、親戚關係互動頻率之密集度，參與社區活動的項目，關係品質包括家庭關係品質，人際相處的困擾。鄰里關係越密，參與社區活動越多，人際相處的困擾越少，越感到快樂；人際相處的困擾越少，煩惱越少；家庭關係品質越佳，鄰里關係，以及親戚關係越密，心理健康的問題越少。主觀的經濟狀況越佳，

越感到快樂，煩惱越少。

固然個人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對於心理幸福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社會階層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往往不大，社會階層透過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進而對於心理幸福的間接影響也就很小。與社會網絡有關的變項中，和社會階層具有關連性的是“親密網絡（如配偶與好友）的階層高低，與求職時所能動用的社會資源”；社會階層越高者，越可能與同樣是高階層者交往與結婚，而且求職時越能動用高地位介紹人，較容易找到好工作（Lin, 1982; 1994; Hsung and Hwang, 1992; 孫清山與黃毅志, 1994, 1997），然而網絡整合程度、關係品質卻不見得越高，高階層的人也就不一定比較快樂而少煩惱。

在本研究的分析中，唯一比較能解釋社會階層與心理感受之關連的中介變項是“主觀經濟狀況”；在大樣本的情況下，全家收入對於快樂的影響固然不大（ $\beta = .11$ ），還是達到了顯著（ $P < .05$ ），全家收入增加，會提高主觀經濟狀況，進而增進快樂，然而全家收入對於主觀經濟狀況的影響仍然不是很大（ $\beta = .14$ ），全家收入對於快樂的影響也就不大。這反映出客觀的事實（收入）與主觀的認定（主觀經濟狀況）間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往往經歷心理調適過程後，窮人也可能主觀認定“經濟狀況”還不錯，收入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也就受到了限制。如此的“心理調適過程”當也能部份解釋教育、職業、階級與心理幸福的整體關連之微弱。如此的“心理調適”固然有助於改善下階層民眾的心理幸福，使他們覺得“還不錯”而安於現狀；然而這也就使得下階層民眾，如工人，要從認清“工作條件與生活機會”都很不理想的客觀事實，進而轉向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最後針對本研究在台灣所得到的研究發現，與中國大陸、西方

社會（主要是美國）的發現作比較。根據林南等人的研究（林南和盧漢龍，1989; Lin and Gina, 1995），在中國大陸客觀社會階層變項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往往很小，甚至於達不到顯著；而社會網絡變項的影響，卻顯得很重要，這與本研究的發現相當一致；相形之下在西方社會所得到的研究發現，較能凸顯出客觀社會階層變項的影響力。

在同樣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與中國大陸所得到的研究發現，有別於西方社會，很可能與兩種不同社會對於“個人主義”的關注程度不一樣有關。根據 Davis and Robinson（1989）的研究，在1970到80年代這段時期內，整個來說，美國民眾的主觀階級認同往往視屬於個人特質的自己客觀社會階層而定，反映出濃厚的個人主義傾向，而且這個傾向從70年代到80年代還有增強的趨勢；相對而言，根據台灣的研究發現（黃毅志，1994），即使到了1990年，就整體台灣民眾而言，他們的階級認同不僅受到自己的客觀階層位置之影響，亦受到與社會網絡相關連的配偶及父母客觀階層位置之影響；這仍反映出中國人重視社會關係網絡的“他人取向”（楊國樞，1984），而有別於美國之個人主義。很可能在西方社會比較強調個人主義，追求個人成就，因而本人客觀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影響較為明顯；與中國大陸同樣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特別強調“他人取向”，因而社會網絡的影響也就顯得特別重要，本人社會階層的影響就小多了⁹！

⁹ 固然本研究所採用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為一橫斷面資料，無法清楚地根據“資料”分析結果，來證實理論模型中各變項的因果順序；而且和一般調查資料一樣，都有測量誤差的問題。不過仍有適當的“理論”基礎，可以用來支持模型的因果順序，如社會階層與社會網絡為心理幸福的因（請參閱文獻檢討）；祇要藉著多變量分析，如本文所作的多元迴歸，作適當的統計控制，證實了模型中各變項的相關並不是虛假的（spurious），就有理由更加相信“模型裏的因果順序”；許多採用橫斷面資料的研究，也都根據相關的理論來建立因果順序，並藉著

參考書目

行政院主計處

1983 《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

林南和盧漢龍

1989 〈社會指標與生活質量的結構模型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第四期。

孫清山和黃毅志

1994 〈社會資源、文化資本與職業取得〉。東海學報，35：

多變量分析，來檢證因果假設（張立雲，1988；蔡淑鈴與瞿海源，1988；Hsung and Hwang, 1992；Kalleberg, 1977；Farkas et al., 1990）；這就實時性追縱調查資料蒐集不足的台灣社會學界而言，也就成了檢證因果假設時，通常所能採用的策略。更何況有許多實時性追縱調查研究，又都已證實了“社會支持、社會整合都有增進心理幸福的作用”（House et al., 1988；Umberson, 1996）；社會支持、社會整合與心理幸福的正相關，不能祇用“心理幸福會提高社會支持、社會整合”來作解釋。同時也有許多實時性追縱調查研究，證實了“階層為因、心理幸福為果的因果順序”，造成了“階層越高，越快樂，心理越健康”的關連性，而非相反的因果順序（Aneshensel, 1991: 18；Link et al., 1993）（可參閱文獻檢討）。

即使細心的讀者仍會質疑：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性，還是可以歸因於相反的因果順序，即心理幸福為因，社會階層為果。那麼本研究依迴歸分析所估計的“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性（ β ）”，也就包含了“心理幸福為因，社會階層為果”的效應，這項 β 值將高估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影響。然而本研究卻又發現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性（ β ），大都很小且達不到顯著（ $P < .05$ ），這對於“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影響”，可能還有所高估，實際上真正的影響可能比本研究所發現的 β 值還小。

以上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性（ β ）很小，應該也不能歸因於依變項“心理幸福”的測量不佳。本研究分別以“生活快樂”，“煩惱”，以及“心理健康問題”做測量，仍都發現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性很小，其中“心理健康問題”還是由10項題目所組成的量表；不過本研究同時也發現社會網絡變項的影響就大多了！如果變項的測量，特別是依變項的測量真的大有問題，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性應該也會很小，而R square會很低；然而就以心理變項為依變項的研究而言，本研究加入社會網絡等中介變項以後，對於心理幸福的R square可說已經很高了！

綜合上述，應該還是可以作出“在台灣社會裏，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沒多大關連，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沒多大影響”之結論，更何況就本文所說明的台灣社會之實際情況而論，這項結論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 127-150。
- 1997 〈台灣階級結構：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九零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頁 57-101。
- 張芸雲
- 1988 〈工作滿足：其概念與理論架構的檢討〉。《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六十三期，頁 63-86。
- 1989 〈生活壓力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 68 期：頁 189-226。
- 黃毅志
- 1994 〈台灣地區民眾主觀階級認同〉。《東吳社會學報》，第三期，頁 265-292。
- 楊國樞
- 1984 〈工業化過程中國人性格與行為的矛盾現象〉。楊國樞、葉啟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頁 357-384，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熊瑞梅
- 1995 〈社會網絡的資料蒐集、測量及分析〉。章英華，傅仰止，瞿海源編，《社會調查與分析：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之一》，頁 313-356，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蔡淑鈴和瞿海源
- 1988 〈性別與成就抱負：以台大學生為例〉。《中國社會學刊》，第 12 期，頁 135-168。
- 瞿海源
- 1991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4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Aneshensel, C. S.
- 1992 "Social Stress: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15-38.
- Blau, P.M.
-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lau, P.M. and O.D. Duncan
-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dler, C. R. and Tsai Yung-mei(蔡勇美)
1992 "Intergation, Anomie, and Suicide Receptivi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3:191-208.
- Davis, James. A.
1982 "Achievment Variables and Class Culture: Family, Schooling, Job and Forty-Nine Dependent Variables in the Cumulative G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569-586.
- Davis, N. J. and R.V. Robinson
1988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1970s and 198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103-112
- Downey, D. B.
1995 "When Bigger is not Better: Family Size, Parental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746-761.
-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Glencoe, IL: Free Press.
- Emirbayer, M. and J. Goodwin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1411-1454.
- Farkas, G. et al.
1990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chool Suc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27-142.
- 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1380.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481-510.
- Gruenberg, B.
1980 "The Happy Work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247-271.
- Hagen, J. et al.
1995 "Delinquency and Disdai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ntro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among East and West Berlin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028-1052.
- 1996 "New Kid in Town: Social Capital and Life Course Effects of Family Migration on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368-385.
- House, D. et al.
1988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Suppor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293-318.
- Hsung, Ray-May and Yih-Jih Hwang
1992 "Job Mobility in Taiwan: Job Search Methods and Contacts Stat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I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Feb.13-17,1992.San Diego, C.A., U.S.A.
- Kalleberg, A.L.
1977 "Work Values and Job Rewards: A Theory of Job Satisf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124-143.
- Kessler, R. S. and P. D. Cleary
1982 "Social Clas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463-478.
- Kohn, Melvin L.
1969 *Class and Conformity: A Study in Values*.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Knoke, D. and J. H. Kuklinski
1982 *Network Analysis*. Sage University Paper 28.
- Lee, S. and M. C. Brinton
1996 "Elite Edu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176-192.
-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Pp131-146 in P.

- Marsden and Nan Lin(ed.)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 1994 "Action, Social Resour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1:67-85.
- Lin, Nan and Gina Lai
- 1995 "Urban Stres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1:1131-1145.
- Lin, Nan and Walter M. Ensel
- 1989 "Life Stress and Health: Stressors and Resour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382-399.
- Lin, Nan,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393-405.
- Link, B. G., M. C. Lennon and B. P. Dohrenwend
- 1993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pression: The Role of Occupations Involving Direction, Control, and Plan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351-1387.
- Lipset, S. M. and R. Bendix
-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sden, P. V. and K. E. Campbell
- 1984 "Measuring Tie Strength." *Social Forces* 63: 482-501.
- Powell, B. and L.C. Steelman
- 1993 "The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Beings Spaced out: Sibship Density and Educational Prog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367-381.
- Rosenberg, Morris et al.
- 1995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141-156.
- Ross, C. E. and Chia-ling Wu
- 1995 "The Links between Education and Heal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719-745.
- Sorokin, P. A.
- 1927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Sui-Chu, E. H. and J. D. Willms

- 1996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Eighth-Grade Achieve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126-141.

Teachman, J. D.

- 1997 "Social Capital interacts with Human Capital." *Social Forces* 75:1343-1359.

Treiman, D. J.

-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Umberson, D. et al.

- 1996 "The Effe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837-857.

Williams, D. R. and C. Collins

- 1995 "US Socioeconomic and Racial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349-386.

Wright, E.O.

-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right, E.O. and L.Perrone

- 1977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32-55.

Stratification, Social Network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Yih-Jyh HWANG

(ABSTRACT)

Recently, most researches on quantitative social stratification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 to influence attainment of one's social strata," as well as researches on status attainment.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 of attainment of one's strata," for example, the consequence of objective strata on "life chance or style" and the associate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s not sufficient, especially the latter. Researches on status attainment assume that "one's strata, like occupation, have much influence on life chance, and further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accuracy of assumption needs further study.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data "Social Change Survey in Taiwan." In concept construction, besides analyze the consequence of objective strata, like occupation, income, education, Marxism clas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explore "the consequence of social network," a new focus on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or the residents in Taiwan, one's education, occupation, income, and Marxism class have no much consequence on hi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cluding happiness, worry, and mental health. People in lower strata don't feel happy and decrease worry for their contentment; contrastively, people in higher strata don't increase happiness, reduce worry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 for better work and resource.

The stronger association with the whol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for the residents in Taiwan, consists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from one's social network. The close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the better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happier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ersonal social integra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re influential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ut social strata don't influenc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much, and through both,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Lin Nan's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By comparison, the findings in Western society appear much consequence of objective social strata variables. The study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oth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society, probably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emphasis on "individualism." Because the Western society probable weights much on individualism and seeks for personal achievement, the objective social strata has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However, Taiwan stresses "collectivism," as Mainland China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is stronger and that of personal social strata becomes weaker.

Key Words: Social Strata, Social Network,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